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如何影响 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

——来自CFPS 2022的证据

王思文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4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4日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生产生活场景中的持续扩散，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社会交往和就业方式，也影响了居民对生活状态和未来发展的主观评价。本文基于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地区在业居民样本，从个体主观认知视角出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考察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互联网重要性感知显著正向关联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均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其中工作满意度路径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强。研究结论表明，在农村互联网接入条件持续改善的背景下，提升农村居民数字融入质量、改善工作体验并完善心理支持体系，有助于促进其主观福利水平提升。

关键词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主观福利水平，结构方程，农村在业居民

How Does the Percep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Affect the Subjective Welfare Levels of Rural Residents?

—Evidence from CFPS 2022

Siwen Wa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y 14,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life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rural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scenarios,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not only transforme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but also influenced reside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ample of employed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2022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CFPS), this study examines, from an individual subjective cognition perspectiv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erceived internet importance on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further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s of mental health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internet importanc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both mental health and job satisfaction serve as mediators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ob satisfaction being relatively stronger. The conclusions suggest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improvements in rural internet access,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digital integra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improving work experiences, and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s can contribute to elevating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words

Percep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Subjective Level of Well-Being, Structural Equation, Employed Rural Reside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嵌入社会生活，互联网已经成为居民获取信息、维系社会关系、参与学习培训、开展工作活动和使用生活服务的重要工具。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也逐渐进入就业、消费、社交、娱乐和公共服务使用等日常场景。互联网与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数字化发展社会效应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为了解决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不同个体或群体在数字技术接入、使用能力和收益获取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接入条件持续改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¹，我国网民规模从2005年的1.11亿人增长至2022年的10.6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也由8.5%提升至75.6%，为进一步讨论农村居民数字融入质量提供了现实背景。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提出，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鸿沟研究逐渐从接入差异扩展到使用差异、能力差异和收益差异。既有数字鸿沟研究多关注不同群体在互联网接入、设备拥有和使用能力方面的差异[1]-[3]。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信息获取、社会交往、工作支持和生活服务等渠道影响个体福利评价[4][5]。然而，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单纯的接入差异已不足以解释农村居民在数字生活参与程度和福利获得方面的差异。不同个体即使具备相似的互联网接入条件，也可能因为对互联网功能价值的认知不同，而在使用意愿、使用深度、使用场景和收益转化方面存在差异[6]-[8]。因此，农村数字融入问题还包括“是否认为互联网重要”“是否愿意将互联网嵌入工作和生活”等主观认知层面的差异。

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cnnic.net.cn/>。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关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如何影响主观福利评价。互联网重要性感知是指个体对互联网在工作、学习、休闲娱乐、亲友联系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重要程度的主观评价。与互联网接入、使用频率等行为变量相比,互联网重要性感知更强调个体对互联网功能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如果其认为互联网能够帮助获取信息、便利生活、拓展社会联系、支持工作活动或改善休闲体验,那么这种主观认知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心理状态和主观福利评价。主观福利水平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和未来发展的综合评价。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主观福利水平不仅受收入、教育、健康等客观条件影响,也受心理健康、工作体验、社会关系和未来预期等主观因素影响。已有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福利之间的关系。张京京等(2020)从互联网使用频率出发,将互联网使用区分为生产性使用和生活性使用,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9]。周烁等(2021)进一步从主观福利效应角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福利评价的影响,强调生活满意度、工作体验等主观评价指标的重要性[10]。熊春林等(2023)指出,单纯的互联网使用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提升,个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理解和信任感同样值得关注[11]。这些研究说明,互联网与主观福利之间并非简单的技术接入关系,而可能通过个体的使用方式、主观认知和社会心理机制发生作用。基于此,本文利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选取农村在业居民样本,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从互联网重要性感知这一主观认知角度切入,补充了以往主要关注互联网接入或互联网使用行为的研究视角;第二,将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比较二者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作用差异。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局限。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既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主观福利水平密切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只体现为接入或使用频率,也可能通过个体对互联网功能价值的认知发生作用。参考周烁等(2021)的研究思路,本文将当前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纳入主观福利水平测量框架。互联网重要性感知越强,意味着个体越可能认可互联网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功能价值,并由此增强数字生活参与主动性,改善生活便利感、资源可得感和未来发展信心。尤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互联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距离和信息约束,为其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来源、生活服务和社会互动渠道。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农村居民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主观福利水平呈正相关。

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不仅体现在生产和工作领域,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和社会联系之中。从主观福利形成机制看,心理健康是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重要因素之一。互联网可能为农村居民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空间。尤其是在家庭成员流动、线下社交资源有限或日常生活相对单一的情境下,个体对互联网重要性的认知越强,越可能通过线上联系、娱乐活动和信息交流获得心理慰藉,从而减少孤独感、悲伤感等负面情绪[12]。由此,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可能通过心理健康与主观福利水平发生间接关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心理健康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还可能通过工作满意度与主观福利水平发生联系。互联网能够通过在线学习、信息获取、就业机会识别和数字化生产活动等方式进入农村居民的工作与生产过程。若个体认为互联网对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具有较高重要性,就可能更容易利用互联网获取工作信息、学习技能、提高工作便利性,并改善对工作收入、安全、环境和时间安排的评价。相比单纯收入水平,工作满意度更能反映

个体对工作状态的主观评价,并进一步影响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对于在业农村居民而言,工作满意度不仅影响其经济获得感,也会影响其生活稳定感和未来预期。因此,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可能通过提升工作满意度,进一步增强农村在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工作满意度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互联网重要性感知既可能直接关联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也可能通过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两条路径与主观福利水平发生联系。其中,心理健康路径主要体现互联网的社会联系和情绪支持功能,工作满意度路径主要体现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工作便利和生产性功能。

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3.1. 研究设计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后续使用 SPSS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 AMOS 24.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并使用 STATA17.0 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模型以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主观福利水平为结果变量,并将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设定为中介变量。同时,为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个人工作收入对数值纳入控制变量。为保持模型图的简洁性和可读性,控制变量路径未在图1中展示。需要指出的是,受横截面数据性质限制,本文难以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严格识别。结构方程模型在本文中的主要作用,是在理论假设基础上检验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关联结构及路径关系。因此,本文后续实证结果更多反映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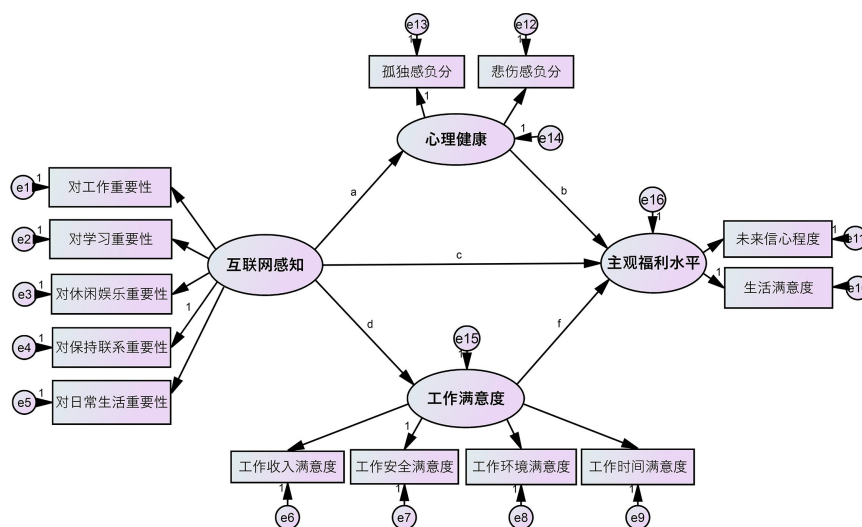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3.2. 变量选取

模型中包含四个潜变量: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主观福利水平。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由网络对工作重要性、互联网对休闲娱乐重要性、互联网对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重要性、网络对学习重要性、网络对日常生活重要性衡量,分别对应 CFPS 2022 问卷中的问题“网络对您/你的工作有多重要?”“网络对您/你的休闲娱乐有多重要?”“网络对您/你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有多重要？”“网络对您/你的学习及获取资讯有多重要？”“网络对您/你的日常生活有多重要？”。各题项数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互联网越重要。

工作满意度由 CFPS 中提取的测量变量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安全满意度、工作时间满意度、工作收入满意度衡量，分别对应 CFPS 2022 问卷中的问题“对这份工作的工作环境有多满意？”“对这份工作的安全性有多满意？”“对这份工作的工作时间有多满意？”“对这份工作的收入有多满意？”。各题项数值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由于工作满意度相关题项仅适用于有工作经历或当前在业的受访者，本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样本限定为农村在业居民。

心理健康由孤独感、悲伤感衡量，分别对应 CFPS 2022 问卷中的问题“在过去一周内的发生频率，我感到孤独。”“在过去一周内的发生频率，我感到悲伤难过。”，受访者 1~4 的打分，表示几乎没有(不到一天)、有些时候(1~2 天)、经常有(3~4 天)、大多数时候有(5~7 天)，为保证变量方向一致，本文对上述题项进行反向编码，使得反向后的得分越高表示负面情绪越少，即心理健康水平越好。

主观福利水平由对自己生活满意度、对自己未来信心度衡量，分别对应 CFPS 2022 问卷中的问题“对自己生活满意度”“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各题项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主观福利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个人工作收入对数值。其中，健康状况采用受访者自评健康变量，并进行反向编码，使得数值越高表示健康状况越好；个人工作收入用于控制个体经济状况，在模型中根据需要进行对数化处理，以降低收入分布偏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3.3. 数据处理与来源

本文首先对来源于 2022 年 CFPS 的数据进行筛选。首先，保留农村地区相关样本，以保证研究对象符合农村居民特征；其次，由于本文包含的工作满意度变量，其题项仅适用于在业受访者，因此进一步保留农村在业居民样本；再次，剔除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主观福利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存在关键缺失值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后，最终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有效样本为 2548 个。

根据 SPSS 描述性统计可以了解样本情况。样本中男女比例持平，中青年为主要群体，45 岁以下占比 71.2%；从学历来看，样本中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初中及高中阶段教育水平为主。从个人收入来看，农村地区居民个人工作收入在 5 万元及以下的样本占 64.4%，10 万元及以下的样本占 93.6%，样本收入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在模型中采用个人工作收入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

4.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4.1. 模型估计

本文根据以上分析，以 2022 年 CFPS 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为自变量，主观福利水平为因变量，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个人工作收入对数值为控制变量。采用 AMOS24.0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可以得到潜变量之间的主要路径关系及各观测变量的测量关系。具体的模型拟合结果、路径系数和中介效应检验将在后文进一步报告。

4.2. 模型检验

4.2.1. 结构方程模型信度分析

本文首先对各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反映量表内部一致性。结果见表 1，各潜变量的克隆巴赫 Alpha 都在 0.7 左右，信度水平仍处于可接受范围，样本数据通过了信度检验，说明量表可靠。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表 1.** 信度分析

潜变量	可靠性分析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心理健康	0.681	2
主观福利水平	0.708	2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0.768	5
工作满意度	0.754	4

4.2.2. 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性因子分析

表 2 显示, KMO 值大于 0.7,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在 0.1%水平上显著, 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是为了确定变量间的潜在结构, 结果见表 3、表 4, 共提取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61.785%。旋转后的成分矩阵显示, 各观测变量在对应因子上的载荷整体较高, 且不同维度之间区分较为清晰, 说明四个潜变量的结构基本合理。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s tests**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66
近似卡方		7785.45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78
	显著性	0.000

Table 3.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表 3.** 总方差解释

成分	总方差解释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3.168	24.370	24.370	20.189	20.189	3.168	24.370	24.370	20.189
2	2.217	17.050	41.420	17.942	38.131	2.217	17.050	41.420	17.942
3	1.581	12.162	53.583	11.900	50.031	1.581	12.162	53.583	11.900
4	1.066	8.202	61.785	11.754	61.785	1.066	8.202	61.785	11.754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共提取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61.785%。

Table 4.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表 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测量变量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4
工作环境满意度	0.644			
工作安全满意度	0.801			
工作时间满意度	0.819			

续表

工作收入满意度	0.738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0.706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0.709	
网络对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重要性		0.636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		0.794	
网络对日常生活重要性		0.745	
孤独感负向得分		0.864	
悲伤感负向得分		0.855	
对自己生活满意度			0.834
对自己未来信心度			0.861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5 次迭代后已收敛			

4.2.3.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验证因子结构与数据的匹配度，本文进一步通过 AMOS24.0 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1) 模型适配度检验

根据 AMOS24.0 可以得到表 5 拟合系数，整体的模型与数据适配度良好。其中 CMIN/DF 略高于部分严格标准，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13]，但仍处于常用可接受范围。

Table 5. Overall fitting coefficient
表 5. 整体拟合系数

整体拟合系数表							
统计量	CMIN/DF	RMSEA	GFI	AGFI	CFI	IFI	TLI
检验值	3.472	0.031	0.988	0.982	0.981	0.981	0.975
适配标准	1~5	<0.05	>0.9	>0.8	>0.9	>0.9	>0.9
模型适配度	可接受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2) 收敛效度

根据 AMOS24.0 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得到 AVE、CR，见表 6。其中，AVE 大于 0.36 为可接受、大于 0.5 为理想状态[13][14]，主观福利水平和心理健康的 AVE 大于 0.5，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和工作满意度的 AVE 略低于 0.5，但均大于 0.36。综合来看，测量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收敛效度。

Table 6. AVE and CR
表 6. AVE、CR

潜变量	AVE	CR
主观福利水平	0.550	0.709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0.409	0.773
工作满意度	0.448	0.760
心理健康	0.522	0.687

(3) 区分效度

根据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得表 7，各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各潜变量 AVE 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区分效度较好。

Table 7. The square root of the latent variable AVE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 7. 潜变量 AVE 平方根与相关系数矩阵

潜变量	主观福利水平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工作满意度	心理健康
主观福利水平	0.742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0.264***	0.640		
工作满意度	0.333***	0.165***	0.669	
心理健康	0.417***	0.077***	0.029***	0.724

***表示在 0.1%的水平上显著；对角线为 AVE 平方根，非对角线为潜变量相关系数。

4.3. 模型的路径分析与中介效应

4.3.1. 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8，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主观福利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关联，H1 得到支持。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对主观福利水平均在 0.1%水平上显著正向关联，说明工作满意度路径具有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基础。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心理健康仅在 10%水平上显著、心理健康对主观福利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关联，说明心理健康与主观福利水平关系密切，但前端路径关联较弱。

Table 8. Path analysis results
表 8.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Estimate	S.E.	C.R.	P
心理健康	<----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0.065	0.034	1.899	0.058*
工作满意度	<----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0.202	0.039	5.123	0.000***
主观福利水平	<----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	0.402	0.045	8.851	0.000***
主观福利水平	<---- 工作满意度	0.249	0.029	8.655	0.000***
主观福利水平	<---- 心理健康	0.438	0.040	10.870	0.000***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1%的水平上显著。

4.3.2. 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并以偏差校正 95%置信区间判断效应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9。互联网重要性感知通过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02599、0.03599，二者均通过 Bootstrap 检验，说明两条路径中介效应显著，H2、H3 得到支持。进一步比较两条中介路径可以发现，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大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约为心理健康中介效应的 1.38 倍。这说明，在农村在业居民样本中，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不仅能够通过改善心理状态和工作体验实现，其影响更集中地体现在工作发展层面。由于工作满意度直接关联农村居民的经济获得感、生活稳定感和未来预期，互联网重要性感知越强，个体越可能认识到互联网在获取就业信息、学习工作技能、拓展生产经营渠道等方面的价值。这种认知更容易转化为对工作收入、安全、环境和时间方面的积极评价。因而，工作满意度路径具有较强的现实基础和

解释力。相比之下，心理健康虽然能够通过线上联系、休闲娱乐和信息交流得到一定改善，但其还受家庭结构、现实社会支持、身体健康、生活压力和线下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因此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心理状态的作用相对更具情境依赖性。

Table 9. Standardization effect and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s
表 9. 标准化效应与 Bootstrap 置信区间

路径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BC 95% CI		P
				Lower	Upper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主观福利水平	—	—	0.232033	0.18020	0.28833	0.000***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 主观福利水平	—	0.06199	—	0.03652	0.08948	0.002**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心理健康→主观福利水平	—	0.02599	—	0.00745	0.04544	0.008**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工作满意度→主观福利水平	—	0.03599	—	0.02344	0.05222	0.000***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主观福利水平	0.17004	—	—	0.11993	0.22131	0.000***

***表示在 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中保留 5 位小数。

5.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局限

本文基于 CFPS 2022 农村在业居民样本，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 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水平呈显著正相关。(2) 心理健康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当农村居民越认可互联网的重要性时，其可能更容易通过线上沟通、娱乐活动和外部信息获取获得心理慰藉，从而减少孤独感、悲伤感等负面情绪，并进一步提升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3) 工作满意度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互联网重要性感知不仅直接关联主观福利水平，也能够通过改善农村在业居民的工作满意度进一步关联其主观福利评价。相比于心理健康，互联网重要性感知对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更明显地通过工作体验和生活稳定预期实现。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提升农村数字融入质量。农村数字发展不应仅停留在网络接入和设施覆盖层面，还应重视农村居民对互联网功能价值的理解与实际使用能力。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可结合农村居民日常需求，围绕线上缴费、医疗挂号、就业信息查询、学习培训、亲友联系和生活服务场景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帮助农村居民更有效地使用互联网，提高数字资源的可及性和转化能力。第二，强化互联网对农村就业和工作的支持作用。数字化服务应更多嵌入农村居民的就业、生产经营和技能提升场景。加强线上就业信息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农产品销售支持和数字化经营指导，提升农村在业居民利用互联网改善工作状态的能力。第三，完善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服务。提升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不能仅依赖互联网普及或线上娱乐，而应结合家庭支持、社区互助、基层心理健康服务和线下社会关系建设。对于留守老人、外出务工家庭成员和社会支持较弱群体，应建立更具针对性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服务机制。第四，提供差异化数字服务支持。不同农村群体的数字需求和使用能力也不同。对于数字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应降低数字服务使用门槛，提供简洁、可操作的指导；对于农村在业群体，应重点加强互联网与就业、培训和生产经营的结合；对于非在业群体，应更多关注互联网在生活服务、社会联系和公共服务获取方面的作用。通过分类施策，提升农村数字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本文使用 CFPS 2022 横截面数据，难以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严格识别。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在理论假设基础上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关联结构和路径关系，但结果主要反映统计关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效应。第二，本文将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因此结构方程模型样本限定为农村在业居民。该处理能够保证工作满意度题项的适用性，但也意味着研究结论主要适用于农村在业群体，不能直接推广至全部农村居民。未来研究可寻找更具普适性的经济评价或生活质量指标。

参考文献

- [1] 尚子娟, 薛羽恬. “政府-社会-家庭”三位协同视域下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及其对策[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1(6): 84-95, 124.
- [2] 黄雨晴. 中国数字鸿沟的成因与赋权式治理[J]. 学习与实践, 2022(9): 23-33.
- [3] 许庆红. 数字不平等: 社会阶层与互联网使用研究综述[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7, 37(5): 16-20.
- [4] 毛子骏, 邹啟. 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 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4(5): 79-89.
- [5] 谭远发, 朱春霞. 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 “红利”与“鸿沟”[J]. 西北人口, 2024, 45(3): 25-38.
- [6] Hargittai, E. (2002) 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 Differences in People's Online Skills. *First Monday*, 7, 1-20. <https://doi.org/10.5210/fm.v7i4.942>
- [7] van Dijk, J. and Hacker, K. (2003)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 315-326. <https://doi.org/10.1080/01972240309487>
- [8] van Deursen, A. and van Dijk, J. (2011) Internet Skill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13, 893-911.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0386774>
- [9] 张京京, 刘同山. 互联网使用让农村居民更幸福吗?——来自 CFPS2018 的证据[J]. 东岳论丛, 2020, 41(9): 172-179.
- [10] 周烁, 张文韬. 互联网使用的主观福利效应分析[J]. 经济研究, 2021, 56(9): 158-174.
- [11] 熊春林, 谢燕, 龚林青. 互联网使用、基层政府信任感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 CSS2019 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社会, 2023, 39(3): 66-75.
- [12] 郑晓晨. 基于结构方程的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财经大学, 2024.
- [13] 尤梅, 刘安诺, 丁原, 等. 代际支持、社会网络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及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J]. 现代预防医学, 2023, 50(10): 1859-1863, 1875.
- [14] 余构雄, 刘博, 尹书华. 入境商务游客视角下的城市目的地形象维度构成及量表开发[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3, 39(11): 1409-1417.